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 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仲明

2010年8月14日至16日,由西南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主办,重庆市渝台交流促进会、重庆图书馆等协办,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承办的“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北碚区召开,来自大陆、台湾的学者90人与会,提交论文60篇,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社会诸方面。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分别致辞,冀望在大后方抗战精神鼓励下,两岸学者进一步深入开展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西南大学副校长宋乃庆宣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章开沅的贺信。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了关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筹备与开展情况,和《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规划情况。

一、政治研究方面

周勇、何林(西南大学博士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问题研究——基于理论历史学研究范式》认为应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问题的研究视角、内容、方法、结论及档案利用、理论创新上不断展开与深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的《九一八事变初学生反日运动的潮起潮落及其影响因素》论述了此次学潮人数、范围、运动的激烈程度等非以往学运可以比肩;但学潮缺乏组织,显得散乱脆弱,又缺乏工农商各界的配合,最终在政府的阻止与安抚下,归于平息,并未取得实际成果。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潘洵的《略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大后方战略地位的演变过程,认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演变与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密不可分,也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和中国抗战实力的判断与认识有关”。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国镛的《再论战时重庆的“行都”之实与“行都”、“陪都”之名》论述了抗战时期的重庆,“经历了一个从四川省辖的乙种市到升格为‘战时行都’甲种市再到行政院直辖的国民政府之‘战时行都’和‘永久陪都’直辖市的转变过程”。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向中银的《抗战时期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与政府关系论析》认为:以府会合作为主、监督制约为辅的地方民主实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地方精英参政议政,政府引导议题讨论;政府施政适度公开,临参会实行有限监督;议案执行有所保留,权利保护有所进展。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刘维开的《蒋中正于国防最高委员会对川渝事务之指示》,论述了蒋氏手谕中关于重庆、四川地方事务中有关防空疏散、地方自治,人力货车担载物品过重、设立戒烟院等应由地方政府负责之地方事务。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林楠法的《胜利前夕蒋介石对美、对共的态度(1945年1—8月)——以日记为中心的观察》认为:“从抗战胜利前夕蒋与美及中共的关系可以看出战后美、苏、国、共的发展脉络,雅尔塔密约及日本投降前的中苏友好同盟确实影响到国府对东北的权益,国共重庆会谈也只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政策的延续”,国共谈判亦无结果。

二、军事研究方面

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刘庭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地位作用新探》认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当局战略指导基本上是成功的；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整体上抗战仍较积极；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战场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开始独力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方针，并发动皖南事变，正面战场的作用下降至次要位置；1944年至1945年8月，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的《广岛原爆与重庆大轰炸之比较研究》，通过对广岛、重庆政治历史地位的比较；和战后两地对于战争历史的纪念、宣传与研究，指出：“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广岛原爆研究及其和重庆的比较研究，显然处于后进状态，其原因除意识形态等特殊因素之外，也同中国内地学界长期缺乏对于侵华日军的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后进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陈鹏仁的《从日方资料看重庆大轰炸》，论证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逐步升级，妄图摧毁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唐学锋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空中保卫战研究》论证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空中战场实际上是一个中苏美空军联合抗击日军的国际战场；联合作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成功地保卫了两条国际空中援华运输线。

三、经济研究方面

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唐润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开发的历史梗概》论证中国西部抗战大后方在开发进程中所经历的由西北转向西南、再由西南转向西北的过程，既是战争背景、政治环境、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也是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和当时国家的有识之士，适应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审时度势的必然。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尚季芳的《论战时国民政府开发西部取得的成效及其不足》论证了国民政府在推进农业、发展工业、筹办工垦、发展交通、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例行节约等一系列开发大后方政策上取得的成效和不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守广的《抗战时期西南工业的历史考察》论证了由于川渝地区成为内迁厂矿的主要目的地，加之卢作孚等的大力支持，战时西南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推动了西南区域经济、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台湾“国史馆”简筌簧的《1940年四川粮荒肇因之探讨》，分析了抗战中期四川粮荒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国民政府无法瞭解1940年后四川粮价的高涨的肇因，提出有效的管理办法，来平稳粮价，致使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开始走上高物价的冲击，严重中伤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宁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天政的《抗战时期陕西省的水利工程建设》对抗战时期陕西省的水利管理系统、水渠工程修筑、凿井灌溉、河堤及航道修整等水利工程建设进行了考察。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肖雄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办驿运的运价问题》论证了抗战时期由于物价上涨而致使驿运运价上涨，虽经限价、调整，运价仍低于上涨幅度，以至驿运经营每况愈下。

西南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张朝晖的《试论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路径及特点》认为大后方金融网的建设，推进了该地区金融近代化事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志英的《抗战时期重庆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形成与作用》，论证了抗战时期重庆迅速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背景、主客观因素与作用，认为其影响和作用，促进了西部地区金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金融业的近代化。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货币战略初探》指出：国民政府在货币战中采取的策略。一是采取措施，不惜代价在维持法币币值。二是禁用伪币，并维持法币在沦陷区的流通。三是在英美封存中日海外资金后，外汇战为物资战时，国民政府通过非沦陷区推广关金券，并改变限制法币外流的政策，也抛出法币向沦陷区和敌后根据地抢购物资。同时在抗战中，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上拉住英美，获取外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石丽敏的《抗战时期法币的印刷和运输》分析

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法币印刷和运输的概况及印刷与运输问题对法币本身的影响。西南大学马列主义学院鲁克亮、刘琼芳的《抗战大后方省营企业公司研究——以川康兴业特种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探讨了川康兴业公司的成立背景、发展概况、资本构成、管理制度、经营活动等方面,亦就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融入中国传统经济领域和生活中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作了分析研究。

四、文化教育研究方面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力的《从战时文物保护到战后文物索还》,论述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进行文物损失调查;尝试与国际文物保护工作接轨;抗战后期成立中国战区文物保管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成立清理战时文物索赔委员会的全过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夏伙根、彭冰的《记抗战时期重庆的考古和文博活动》重庆图书馆袁佳红的《试论重庆图书馆对馆藏抗战文献的收集整理与保护》重庆图书馆王祝康的《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利用状况调查分析》重庆图书馆王志昆的《现存大后方历史文献及其主要特点研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张莉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重庆旧址的历史考察与价值评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黄晓东的《重庆抗战遗址研究三题》等,亦从抗战时期重庆的考古和文博活动、重庆图书馆对抗战文献的整理保护、重庆图书馆抗战文献的利用调查、大后方历史文献的特点、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的考察、重庆抗战遗址研究等角度做了论述。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汪洪亮的《国族建构与边疆教育: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西南边疆教育言论的分析》认为:边疆教育不仅是在边疆民族层面上的教育,而且被上升到了国族构建、民族复兴的高度。该时期边疆教育的实施,使仅有世俗文化传承而基本没有教育的历史走向终结,在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罗玲、刘力的《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大之比较刍议》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易斌的《抗战时期大后方高校科研学术活动简析》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徐辉、唐智松的《试论抗战大后方高等教育的贡献》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彭泽平、姚琳的《1912—1937年四川高等教育的历史考察》等,亦从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比较研究、战时大后方高校科研学术活动的开展、战时大后方高等教育对国家的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等角度做了论述。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陵合的《经济与社会之间:吴景超抗战时期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初探》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杜俊华、刘洪彪的《论抗战初期重庆大学的经济学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初探——以马寅初为例》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徐辉的《革命教育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初探》等从人物研究的角度,分别论述了抗战时期吴景超的经济学思想、抗战初期马寅初积极议政的爱国思想、抗战时期赵君陶的教育思想。

中央党史研究室李蓉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事和领导的国民党区域文化运动略论——学习〈周恩来文化文选〉有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有关文化活动的开展过程和主要特点。台北中正纪念馆管理处林佳桦的《抗战烽火中的摇篮——战时儿童保育会人员建置与工作方针》论述了抗战时期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人员建置培训与保教工作的开展。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黄虹的《试论抗战时期重庆的卫生教育》重庆图书馆任竞、唐伯友的《浅析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医疗救护——以重庆为中心的考察》分别论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卫生教育(包括学校卫生教育和社会卫生教育)的开展状况、重庆后方医疗救护的成效与不足。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张瑾的《大后方的“前线”——〈纽约时报〉镜像中的陪都重庆》论证了抗战时期《纽约时报》对日军轰炸重庆的报道,探讨其报道特色及其新闻的话语特征,从一个侧面探究西方主流媒体镜像中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五、文学艺术研究方面

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邵铭煌的《战争与电影——三个台湾人战时在大陆的际遇》通过对三个台湾电影人(何非光、林正亨、刘呐鸥)抗战时期在中国大后方的经历,客观地反

映他们在抗战中的艺术活动、政治取向和不同结局。台湾成功大学林德政的《战时重庆电影与话剧：以中制厂与王珏为中心》，通过对一位抗战时期在重庆参加电影、话剧演出的台湾艺术家的采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拍演电影、排演话剧的情景。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虞吉、张海燕的《大后方电影 1940 年都市院线“黄金档期”探析》记述了 1940 年 1、2 月份“黄金档期”上演的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影片及苏联、美国的影片等。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蒋娜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述评》记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现状、主要观点及不足，指出目前的研究尚缺乏针对性、系统性、专业性。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凌承纬、张怀玲的《中国抗战文艺阵线上的“短剑”抗战漫画活动和〈八人漫画联展〉》记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抗战漫画活动及《八人漫画联展》概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谢春的《抗战时期关于中国新兴木刻“民族形式”的讨论》认为：木刻家们在木刻民族形式探讨的过程中，改变了战前对西洋美术的盲目崇拜，重新认识了艺术与现实、与生活、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郝明工的《大后方的文学期刊——以陪都重庆为中心》记述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期刊的种量、刊期和影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杨筱的《从重庆战时剧场生活和生态看社会的文化演进》，认为：“战时经由全国主流强势文化的植入，在重庆本土的小文化传统和说唱曲艺戏剧等的地方形式日趋衰减变化，呈现曲艺—川剧—平剧（京剧）—话剧—电影的流变过程。”

六、社会研究方面

台湾“国史馆”王正华的《女性书写下的抗战大后方流亡岁月》，记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陈伟青、徐志英的信件，杜润枰（作者母亲）1939 年的日记及和作者父亲的通信，从这三位女性抗战时期的生活历程，留下抗战大后方庶民生活的写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周惠民的《台湾人的四川印象》记述台湾文化人对四川的认识，抗战胜利后川人入台，川菜起源与在台湾的发展，四川牛肉面的考证，论证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情结。

重庆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常云平、关孜言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通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救助对象、社会救助政策的论述，指出了社会救助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及不足之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龚义龙的《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生存危机与辗转迁移》论述了抗战时期难民的主要去向、人数、阶层、苦难经历、生存危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艾智科的《抗战初期的成都新村建设研究》，认为：抗战初期的成都新村计划体现了近代城市规划理念，在成都建设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及城建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与市民不可避免的冲突。

欢迎会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张国祚和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副书记彭烨亦做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论》和《担当起坚守城市文化记忆的责任》的演讲。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欣赏聆听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的抗战西迁的古琴演奏；祭扫了张自忠将军烈士陵园；参观了“海峡两岸抗战文物展”和抗战漫画展；参观了重庆图书馆中国抗战大后方文献陈列室与抗战文献特藏书库；参观了李子坝公园、周恩来公馆、戴笠公馆、桂园、郭沫若旧居、卢作孚纪念馆、国立复旦大学旧址、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等抗战遗址；观看了反映重庆人民抗战生活的话剧《河街茶馆》。

（作者李仲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责任编辑：徐志民）